

Nonghu 农户投资与
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
Touxu yu Nonghu Jingji Shouru Zengshang de Guanxi Yanjiu
关系研究

■ 张改清 著



9
中国农业出版社

农户投资与农户经济 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

张改清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户投资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张改清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4

ISBN 7-109-09699-8

I. 农... II. 张... III. 农户-投资-关系-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F3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5350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出版人: 傅玉祥

责任编辑 闫保荣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东西部农户经济发展机理及政府管理行为研究”（项目编号：70173016）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农户储蓄借贷行为研究”（项目编号：70141022）的资助。

中国农民的世纪福音（代序）

今年春节，我的学生张改清博士邀我为她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农户投资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写一个序，我欣然同意，但真要动笔时却不知写什么好。说实在话，从改清同学考进浙江大学，到她的论文选题、构思、写作以及最后审阅，我都亲历了，好似半个导师，但更似合作者。改清同学进校后，很快就加入了由我主持的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西部农户经济发展机理及政府管理行为研究”（70173016）和“农村金融体制变革中农户储蓄借贷行为研究”（70141022）——的整个研究过程，并积极努力地主持了山西部分的调查与研究。这次书稿的修订本，我也看了，感到作者把要说的都写了，写得也比较好。再就论文说什么似有多余，为此，我想借此机会写一篇“农民的福音”和之，以示代序。

农民的梦想

半个世纪前，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惊世动人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似惊雷，又似闪电，震惊了世界亿万双眼睛与心灵。一头沉睡了百年的东方雄狮觉醒了。一个以皇朝更替、文明传承达数千年的东方民族，从此走上一条新的民主之路；一个以农民为大多数，以农业经济为国之命脉，以农业文明为标志，从此走上了一条赶超英美的工业振兴之路。尽管在这一征程中，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绝大多

数时间还依然向国家贡献着“皇粮”与国税，但与皇朝统治下的日子有了质的区别。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农民老大哥”——中国农民，用执著的主人翁精神，不仅亲自参加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同时，还承担着“税”、“赋”之外的高额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无怨无悔，为着心中美好的梦，用青春的激情和终生的努力来换取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推进。这是因为他们将“跳农门”作为自己长远奋斗的目标，将“城里人”作为自己永远向往的梦想。

农民的抗争

25年前，安徽小岗村一间农家草房里那一群彻夜未眠的农民的举动——18人摁下的一纸生死契——似雄心，更似妄为，震惊了中国整个上层意识形态。在上层意识形态还处于理论整合之际，农民们就用自己的朴实实践圆满地给出了答案。由此，被冠之以“农村改革”的一场运动就在中国大地开展了起来。在这一运动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农民用亲身的实践证明着他们的行为是理性的，而政府则用自己的权力在不断地规范着农民的行为以使国家平稳发展。农民的实践与上层的意识形态之间所进行的这场动态博弈，被历史地记录“在案”，农业发展的实绩与农民收入的增长统计数据证明了农民的理性行为，而中央政府从1982年始到1986年连续出台了五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号文件”则记录着他们对农民行为的规范“痕迹”。尽管在这场博弈过程中，农民所采用的方式始终如一，而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则一直处于反复变通过程，从事后总结到事前推动然后又转到事后总结，反映在文件编号由数十号文件到“一号文件”，又由“一号文件”到“二号文件”以及数十号文件；文件形式也有“决定”、“通知”，以及后来的“会议纪要”、“通知”和

“部署”等^①。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央政府所采用的这些方式从某种角度反映出“三农”问题在上层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重视→非常重视→重视”的反复变迁，同时也反映了被冠称为“愚昧”、“落后”的中国农民，其行动有着很大的合理性。尽管在这场运动中，农民与上层意识形态均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但农民用他那不屈不挠的抗争所完成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创举无不令世人称颂。被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推行，使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温饱问题，在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的质疑——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声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民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满意的答复；乡镇企业的异军崛起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之道；农民自发外出寻找就业门路的行为尽管被称为“民工潮”受到这样那样的不公待遇，但始终坚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农民，并没有受“城里人”设置的种种壁垒所左右，坚信自己的外出计划，用实际行动在为中国城市的振兴带来一片繁荣的同时，也为自己回乡重振

①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工作的十项政策”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199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实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雄风积累了最微薄也最有用的原始资本。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正当农民在改革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同时，改革初期所获取的城乡差异明显缩小的成果，受长期的“二元结构思维”影响，相继被“剥夺”。尽管在1998年的“决定”中，中央对农村改革20年的经验用了四个“必须”^①来概括或认识，但恰恰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方面我们有违了这四个“必须”。在粮食问题得到成功解决同时，农村税费负担却日益加重，这是造成农民收入持续多年徘徊或下降的重要根源。由此，农民负担减轻与收入增长问题，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问题就成了新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所在。

农民的福音

五年前，上届政府就着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不懈努力，在全国以试点的形式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尽管关于农民税费负担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在上届政府才有，1984年的“一号文件”中已有“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额外负担”的提法，但在上届政府任期内，这一问题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时期则毋庸置疑，由此，媒体对此的关注也格外多。新一届政府上台后，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就是这一问题，在农村“费改税”的试点结果在各地褒贬不一情况下，仍将试行了多年的农村“费改税”政策全面推开，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大胆的历史性想法也在中南海开始酝酿。在确立了对农政策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下，新一届政府再次以“一号

① “决定”明确指出，农村改革20年的基本经验是：“必须承认并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必须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探索和完善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推进改革的伟大事业。”

文件”形式开始了新一轮农业、农村与农民经济发展的真正扶持。从2003年岁末的“一号文件”的主题——“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可以看出，本届政府把本属于农民自己的事纳入到他的工作议事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中央政府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层意识形态对农民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比较一下1979年中央的“决定”^①与2003年末的“意见”可以看出，过去我们对“三农”问题的重视重心在“农业”，而今天的重视重心则转到“农民”。农业的发展固然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并不等同。如果说过去“三农”政策关心的重点是结果的话，那么今天关心的重点则转为“过程”。正是这一转变体现了本届政府对农民的人文关怀。“意见”中对“农民收入上不去”的认识，用了四对“不仅……而且……”^②作了精辟阐述，把农民增收放到“政治问题”这一高度来认识。可见，农民这位昔日的“老大哥”在改革中沦为“农民工”后，意识形态对此问题的觉醒。新世纪首个“一号文件”让农民感受最深也最为典型的的就是中央政府明确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4年岁末的“一号文件”则进一步指出：

① “决定”对过去20多年我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到：“我们一定要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一定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村以及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正确地进行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抓好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我们一定要持续地、稳定地执行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政策；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我们一定要正确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我们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原则，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

② “意见”中写到，“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尽管这个“一号文件”的主题再次转为农业，用了三对“既是……又是……”^①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紧迫性进行表述，但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农业文件有着质的不同，它与2003年岁末的“一号文件”一脉相承，完全相通，农民问题依然是本文件的核心所在，不过强调角度更加全面罢了。用我听见的福音即含笑九泉的老父亲的话说^②，“农民种地免皇粮，免国税，还要直接给钱，在我所经历的和听到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真是农民的福音”。中国农民的这一福音，我相信他不会短期的，目前仅仅是个开始，未来的福音会更多。

农民的回答

从作者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问卷调查显示，本届政府所作所为已基本得到农民认可，特别事隔18年再次出台的新的“一号文件”后，农民们对农业发展的信心有了明显改观。就农民对土地经营来看，当问及“你认为种地划算不划算？”，在给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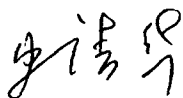
① “意见”中写到：“加强农业基础，繁荣农村经济，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既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既是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突出矛盾的迫切需要，又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战略选择；既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又是实现农村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抓住了这个重点，就抓住了农业发展的关键；把握了这个环节，就把握了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做好了这项工作，就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② 2004年4月7日，父亲用他那特有的“幽默”，在听完山西省襄垣县组织的中央农村政策进村宣传后，一直非常激动，在回家的路上与村民们谈论这世纪农民之福音同时，脚下一滑顺势即走完了他那近80年人生。隔日从沪返乡的我，看到父亲那面带笑容的安详，我的心一下子似有一种交代感，政府的微小努力都可以使农民有如此大的满足，即使还未兑现，农民都那样的知足，我这等被父亲称为“公家人”的农民之子，还有什么可奢望，竭尽全力为中国农民贡献自己那微薄之力即是我的最大追求，也是父亲的最大心愿。

答案的样本中，2002年，74.14%的样本回答“不划算”，其中，样本集中的山西和湖北分别为68.39%和80.95%；2003年，79.70%的样本认为“不划算”，其中，样本集中的山西、河南和湖北分别为68.24%、89.89%和81.89%。2004年，新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实施，农民的回答有了质的区别，回答“不划算”的样本明显下降，降到调查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0.38%，其中，样本相对集中的山西、江苏和吉林分别为43.58%、36.19%和39.06%。就农民对农政执行看，当问及“乡村干部在执行国家土地政策时，有没有曲解政策本意的现象发生？”，在给出答案的样本中，2002年，23.60%的样本回答“有”，其中，样本集中的山西和湖北分别为31.49%和13.48%；2003年，32.36%的样本认为“有”，其中，样本集中的山西、河南和湖北分别为37.14%、43.48%和30.76%。2004年，经过连续2年的整顿后，农民的回答有了明显变化，回答“有”的样本明显下降，降到调查以来的最低点，仅为12.91%，其中，样本相对集中的山西、江苏和吉林分别为18.99%、8.17%和3.54%。

这一数据变化从某种角度反映出，长期的农民外出就业是一种不得已行为。尽管受到诸多歧视，也只能外出，当中央农业政策得到调整后，政府“不作为”之风得到基本整治后，农民回归土地，向土地增加劳动与投资则会成为一种必然。农业的实力增强由此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与此同时，农民的就业心态变化也会对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的城市产业带来一定的冲击。从目前的媒体报道中，在中国大地出现多年的“民工潮”已演变成今日的“民工荒”，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诸如广州、深圳与厦门等，许多企业为民工缺乏大伤脑筋，不少企业高层及政府决策层正在为寻找农民工改变着自己的政策。从中央农业政策的改变，到农民就业心态的变化，再到地方企业政策的修正，这充分显示了本届政府的务实精神，也充分体现了对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农民的尊重。这不由得使我想到宋代大文学家范仲淹先生的政

治梦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一梦想难道不正是今天我们农民的期盼与政府的努力所在。新一届政府目前正在全国推进的和谐有序社会建设的宏大目标难道能不包括我们的广大农民，请农民们放心，在政府与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正向我们走来。请农民们记住，21世纪是包括你们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福音社会。



2005年4月3日写于上海闵行好第坊

自序

— — — — —

农户作为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历经沧海剧变，仍保持其顽强的生命活力，并构成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石。纵观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农户是这一基础产业的主要承担者，肩负着政府的税源、兵源与役源，并作为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新中国的诞生与繁荣昌盛同样谱写了农民英雄的光辉篇章，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旷日持久的全国抗日战争、建设祖国美好家园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发轫于农村的经济体制变革，无不显现出农民百折不挠的精神与集体智慧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户家庭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生产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现阶段受制度供给不足、资金积累水平有限、融资渠道不畅、组织化程度不高、自身素质低下等诸多因素制约，我国农户投资不足、增收乏力的问题仍较突出。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加入 WTO 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农户投资积极性、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首先是推进农户增收的政策选择空间在缩小。在当前国内市场农产品需求增长乏力和农民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受到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入世和开放农产品市场势必使农民增收面临更多挑战。其次是农户家庭经营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就农户自身发展而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农户的两极分化。就外部环境而言，农村产业升级以及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逐步加快，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尤其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小规模经营农

户，受资金、技术和市场信息等条件的限制，生产经营活动会面临更加不利的条件。再次是制度创新不足制约农户增收目标的实现。农村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农业投资主体由过去国家、集体为主的单一投资组合转变为以国家财政投入为导向，以金融部门信贷资金为支柱，农村集体和农户投入为基础的多元化投入新格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确立和深化，使农户成为农业投资最重要的主体。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存在农地制度创新不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与结构失衡等诸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投资，进而影响农户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可见，现阶段研究农户投资及其经济收入增长问题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

本书以农户投资为切入点，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农户经济行为的相关研究，并根据农户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内在关系，提出农户投资与其经济收入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研究农户投资水平、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特征及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关系，最后将本研究的主题置于制度环境中进行分析与思考，论证了农户投资制度环境优化的收入增长绩效。其中所得出的结论不乏真知灼见。

笔者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一向对农户经济极为关注，硕博以来一直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本书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有较大创新：

第一，根据投资与资本的关系，对农户投资的概念进行了专门界定，分析了农户进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并以此构建了资本品质量水平提高的农户生产函数模型，为论证农户投资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第二，运用 Panel Date 模型和 Romer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别估计了影响农户经济收入增长因素的重要程度与贡献率。同时根据对农户家庭教育投资报酬率的界定，采用 Mincer 的教育投资劳动报酬函数估计了农户家庭劳动者教育投资的报酬率以及劳均收入弹性。

第三，运用观察户的系统资料，实证研究了农户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向的产业绩效。同时对不同经营类型和文化类型农户的投资效率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揭示出二者之间具有“趋同”、“趋异”等规律特征，为研究投资效率与经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第四，运用 DEA 非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户潜在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

第五，将问卷调查数据与跟踪观察户数据相结合，估计出民间借贷对农户投资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农户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的投资效应，以及农地调整与流转、税费负担对农户农业投资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当然，书中关于农户投资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有些尚欠完整并有待充实，如对农户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结构如何影响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研究不够深入。书中不足之处，力求在后续研究中得以完善，并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推进农户经济研究的逐步深入。

最后，书中还可能会存在一些疏漏甚至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政清

2005 年 4 月

摘 要

— — — — —

农户作为我国农村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其经济收入增长，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焦点。就当前而言，影响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原因错综复杂，然而农户投资仍然是其中最为直接、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为此，本书以农户投资为切入点，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运用山西固定跟踪观察户资料与问卷调查资料，系统研究了农户投资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关系。

研究思路为：通过系统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农户经济的相关研究，根据农户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内在关系，提出农户投资与其经济收入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研究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特征及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关系，最后将本研究的主题置于制度环境中进行分析与思考。

研究的主要结论有：

(1) 在分析投资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投资与资本的关系，界定了农户投资的概念，并依据农户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内在关系，构建了资本品质量水平提高的农户生产函数。

(2) 对农户投资的变动规律特征进行了系统和动态考察，结果表明，农户投资呈现规模偏小、力度不足、分布不均的特征。就农户物质资本投资而言，投资力度有下降趋势，但投资比重较为平稳，存量呈偏正态分布；就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而言，以正规教育投资为主，家庭劳动者文化程度表现为由偏正态分布向正

态分布转移的趋势，相对正规教育，农户的职业技术培训与健康投资力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半径较小。

(3) 运用新古典综合资本理论，将农户物质资本投资分为资本加宽和资本加厚，同时建立了农户物质资本加宽和加厚与劳均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实证分析得出，物质资本加厚对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加宽。同时运用 Romer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出农户物质资本投资对其经济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80.87%。

(4) 在农户人力资本与其经济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实证分析了劳动者文化程度和职业技术培训对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①随家庭主要劳动者文化程度的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呈增长趋势，同时主要劳动者文化程度与劳务收入以及在技术含量较高产业的收入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②随家庭劳动者综合文化程度提高，劳均纯收入呈增长趋势，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递增报酬关系，但与家庭经营内部一些业别的劳均收入之间呈现弱相关性；③从农户家庭劳动者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情况看，总体上接受培训的农户收入高于没有接受培训的农户收入，且文盲户接受培训后收入增长较高中以上户显著。

(5) 受产业间比较利益的驱动，农户投资的非粮化与非农化倾向显现。在农户产业分化过程中，不同业别的投资对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作用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工业、运输业、园地作物、畜牧业、商饮业、粮食作物、其他农作物的投资对其家庭经营性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这 7 个变量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的解释程度达 90%，其中工业投资的解释程度达到 75.5%。

(6) 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农户投资结构的变化，家庭各收入来源的增长速度和力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态势，进而导致经济收入结构变迁。农户经济收入结构变迁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农户投资的形式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是实现农户经济收入增